

#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霍 巍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成都 610064)

## 目 次

-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 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 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 三 坚定文化自信: 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1〕。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从它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且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伊始,一方面在学术目标、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等环节就不断形成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而是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体系迈进;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考古学者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不断续写新篇,继往开来,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每当时代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考古学都在顺应历史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坚定文化自信上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 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根植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生命力。”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科技的落后,物质的贫弱,国力的衰落,中国一次次处于被动挨打、丧权割地、任人欺凌的境地。国家兴衰、

---

〔1〕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不断寻求出路,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潮流。

俞伟超在论述考古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说:“寻找一种新的认识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需要,是世界各国产生考古学的基本原因。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于本世纪(编者按: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这也正是类似于欧洲十九世纪中叶那样,人们正在到处冲破传统的旧的世界观”〔1〕。考古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绝非偶然,这既有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有内部的现实需要。在这个时代大潮中,改变国人的文化弱势心态,重新树立文化自信,成为解放全民族思想桎梏至关重要的一步。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时人不仅对于中国文化丧失信心,甚至对于中国人种的来源和“种族优劣”都充斥和弥漫着种种怀疑、悲观的论调,“动言中国不如各国之文明”,“处乎今日之世,以中国人与西人较,其粗者,日用之器物,如宫室舟车衣服饮食之类,其稍精者,学术之程度,如文字图画算术政治之类,其最精者,形体之发达,如皮毛骨骼体力脑力之类,是数者,无不西人良而中国窳,西人深而中国浅,西人强而中国弱也”〔2〕。曾经在西方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3〕,此时也再度沉渣泛起,甚至连梁启超、章太炎等当时思想界先驱,都曾试图将“炎黄遗胄”的“先祖来源”追溯到西域“昆仑之墟”或小亚细亚的巴比伦,以求证其与巴比伦和欧洲人具有同样高贵的根系〔4〕。如同陈星灿所述,“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支配着大多数知识分子”〔5〕。

中国是传承有序、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 3000 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 1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在当时要找到这些历史证据,传统的古史系统固然不足征信,尤其是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在西方号称“科学主义”的史学面前,更是受到强烈的冲击震荡。那么,当中国面对巴比伦、古埃及,甚至古印度等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时,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却只能依靠神话和传说来支撑,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作为实证。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学实证则少了一千多年〔6〕。

二十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之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力图以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考辨上古史料,使传统的

〔1〕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 转引自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2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有代表性的如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等,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30—35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27、2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35页,三联书店,1997年。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8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古史观被摧毁殆尽。古史辨运动为重建上古史扫清了道路,使中国的古史研究得以脱离经学,恢复史学的本色,这在客观上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

因此,从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而影响深远的殷墟发掘,从一开始就承担着“重建国史”的历史使命,学术目标十分明确。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许多学者都坚信,当年中国考古学的创立者们之所以要首选安阳殷墟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学实践,主要因为殷墟出土了甲骨文,而近代以来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卓有成效,揭示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从而希望通过殷墟的发掘,确证商史为有据可考的信史。张海认为,“殷墟的发掘绝不仅仅是为了甲骨,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复原殷商时期的历史,……以殷墟为代表的早年考古发掘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即具有明确的学术任务和研究目标,那就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这也决定了中国考古学鲜明的史学研究倾向性”〔2〕,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对于早期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张光直曾经推测,“假如这个第一个大规模的由国家执行的持续发掘,是对一个史前的遗址,那么一个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考古学的独立分支,就可能在中国诞生。但是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字材料: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3〕。这种可能性也许不能排除。事实上,从李济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来看,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学术目标或许并非如其所言,其实践结果也仍然使考古学“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和更新了的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4〕。虽然西阴村遗址是一处史前遗址,但李济发掘这个遗址的主要目的,却是寻找可与当时盛行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相对抗的考古学证据,以求寻找中国文明的真正源头。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掘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称,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这个小小的怀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5〕。他选择发掘西阴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与舜都蒲坂的传说有关,也是基于历史文献记载而做出的选择〔6〕。张忠培在纪念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七十周年时评价道:“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设定为揭示及研究历史,和多学科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方法,虽非始于李济先生,但他

〔1〕 戴向明:《中国考古学观念的回顾与反思》,《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

〔3〕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4〕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5〕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 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第8期。

却是这样对待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位中国考古学者。”〔1〕

如上所论,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们必须要解决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即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必须要回答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为何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从历史上能不能找到答案,应当如何向西方学习等一系列问题〔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下,为了救亡图存,赶上西方,就必须重建古史以振奋人心,这成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确立的最高目标,也形成了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鲜明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3〕。

考古学作为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是基于其以田野考古发掘及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特点的学科,而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器物学、金石学。今天绝大部分中国考古学者都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界定,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4〕。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两者之间就此一刀两断、井河不犯?

一部分学者认为,现代考古学是舶来品,和中国传统金石学须截然分开来看待。如李济在 1934 年出版的《城子崖·序》中说道:“中国人考古的兴趣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但这只是兴趣而已。有兴趣而无真正的办法,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相当的收获。要是把现在的考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的方法冒充黄帝子孙的那一套把戏。”〔5〕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中国考古学”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将中国传统金石学也融入近代考古学之中,并未将二者截然分开。如梁启超在 1926 年瑞典皇太子访华欢迎会上提出,将宋代以来的金石学研究与时下的考古发现视为一个种类的工作,并称之为“中国考古学”,他说:“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6〕稍后出版的《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也将传统金石学和新近的“发掘期”考古学贯穿为一体〔7〕。后来裴文中的《史前考古学基础》〔8〕、张政烺的《中国考古学史讲义》〔9〕、阎文儒的《中国考古学史》〔10〕等著作也基本上认同金石学应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源头〔11〕。一些学者还明确提出,金石学应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马衡在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课程时即特别指出:“考古学一门,为研究史

〔1〕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3 页,科学出版社,1999 年。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3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华夏考古》2011 年第 4 期。

〔4〕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5〕 李济:《城子崖·序》,《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6〕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 年。

〔7〕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 年;《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

〔8〕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 年。

〔9〕 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

〔10〕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1〕 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6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学之重要补助学科。……而本国之金石学，亦为考古学之一部，宜先注意学习。”〔1〕

这些不同的学术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中国考古学兴起之时，中国传统学术并非就此与之断裂，中国史学所具有的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点仍然影响至深且广。这对于此后中国考古学历史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也意味着时人所提出的“中国考古学”这个概念，并非西方考古学的简单复制或翻版，而应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历史传统的。陈星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评论道：“随着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的传播，以及自上世纪（编者按：即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编者按：即二十世纪）初年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活动的开展，使清朝自乾隆以来的研究范围方面大大拓宽了的金石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金石学而古物学而考古学，金石学最终汇入考古学中，成为近代科学考古学的一部分。”〔2〕这种对于中国传统金石学到近代考古学变化演进的逻辑推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综上所述，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并担负起时代的使命。这个学科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几代考古人的崇高信念，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考古工作者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不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的学术目标〔3〕，并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4〕。

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了划分、命名考古学文化的标准，给考古学文化以科学的定义〔5〕。中国各地的考古学工作者开始以考古学文化为工作基准来建构不同地区考古资料的谱系和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此后，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的考古成果，一大批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相应的考古学文化相继被发现、确认，各地先后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框架，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考古学最为重要的科学实践，为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6〕，在中国考古学积累的大量资

〔1〕 转引自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7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52页，三联书店，1997年。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4〕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40、41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6〕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主要作者苏秉琦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之路:“20 世纪的 70—80 年代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转折期,我们经过 60 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1〕苏秉琦后来又通过不断对这一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下述重要的学术观点:第一,将中国史前考古和古文化区划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的深入探索。第二,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文明起源通过三种形式(一是裂变,二是撞击,三是融合),在“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同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终于燃烧成燎原之势。第三,提出中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和“三模式”,即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再到“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演进“三部曲”: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以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为代表的“原生型”;以中原夏商周三代以及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为代表的“次生型”;以北方草原民族和秦汉以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为代表的“续生型”。他认为“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也是试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讨论进行一次总结”〔2〕。

与这个过程大致同时,中国考古学家俞伟超〔3〕、张忠培〔4〕、严文明〔5〕等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田野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丰富资料,结合具体实践,围绕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运用、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与特点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论述。可以说这是我国考古学者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文明起源这个世界性的课题上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俞伟超曾经充满自信地指出:“由于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学者的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国际范围的类型学理论库藏中,已经包含着中国学者的特殊贡献。现在,我国学者还在运用这种经过自己深化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考古资料。”〔6〕这不仅发展了现代考古学语境之下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同时也秉持着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并朝着预定的学术目标前行了一大步。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7—83、99—107、110—143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4〕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 年。

〔5〕 严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 年。

〔6〕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第 62、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通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一系列史前考古的重大成就不仅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还用科学的考古资料展示出以考古学文化为基础、以区系类型为枝干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正如戴向明评价这个阶段前辈考古学家们的贡献时所言：“这些论著将史前史的构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初期所倡导的全方位‘重建历史’的使命重又被唤起，也标志着从文化史的基础研究开始向全面复原史前史、探索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最高目标攀登。”〔1〕

一部中国史前史，主要依靠考古学构建，成就巨大，超越前人。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并鼓励考古学者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习近平总书记所举出的这两个例子，的确是未来史前考古学和原史考古学攻关的难点与重点。可以预期，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界对这些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难题和制约史前研究的瓶颈的认识将不断向前推进。

### 三 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论，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始，就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尤其是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源泉——文化自信密不可分，从救亡图存到民族振兴，考古学都负有崇高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者最为重要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考古学最终要回答哲学层面的问题，苏秉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2〕俞伟超也说：“考古学的产生既然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解答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提出的疑问，今后的任务自然也应是‘为了今天和未来’，为了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时期考古学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几代考古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又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结合前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围绕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这个中心，本文再着重讨论以下三点。

〔1〕 戴向明：《中国考古学观念的回顾与反思》，《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第一,从纵向上既要继续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要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特点、发展轨迹、重大标志性成就和文明传承方式等问题的研究,尤其要加强对形成五千年连续不断的统一体的内在机理、文明基因和外部条件等问题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深刻理解其内涵,有两个重点任务需要落实:一是要利用丰富的地上、地下的文物、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二是要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文化基因。考古学者已经努力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逐步上升到对社会内在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总结。例如,苏秉琦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的发展演变轨迹;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在于:一是中国人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三是核心价值观中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能够正确处理天人(人与自然)关系等内涵认知〔1〕,都很具有启发意义。又如刘庆柱从国家祭祀、古代都城规划理念中的“求中”、“择中”、帝陵制度的传统形成与“华化”进程、礼制建筑与礼制、礼器等不同维度讨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因,以及“中”、“和”等国家政治观念的形成及其影响等问题〔2〕,也是对历史时期考古做出的新的阐释。

这当中还有几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尤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从早期“中国”向着统一的秦汉帝国的演进,其间春秋战国时代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以及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如何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二是秦汉统一之后的近两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形成的几次大动荡、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对于隋唐统一帝国格局的长远影响应当如何正确的认识;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是如何通过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既实现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又成功维护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使之没有像欧洲历史上因所谓“蛮族入侵”而导致中华文化传统断绝或被外族所征服,反而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从秦汉统一帝国形成以来,虽然有分有合,但为何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文化纽带、文明基因却始终生生不息,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创下了一枝独秀、长盛不衰的辉煌历史,这种民族精神和力量源泉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对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认同中华文化、坚定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现实意义。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4—15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第二,从横向上以“一带一路”为主线,继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倡导文明互鉴,通过考古成就观察认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宏大历史图景,讲好中国故事,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向世界贡献中国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

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国也历史性地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考古成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同时也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本身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考古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苏秉琦曾经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分析了中国在人文地理上除了具有“中央与四裔”的特点外,还有“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即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可以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在用区系观点看中国的同时,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这样分析的结果,正好是中国的两半块与世界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半块相衔接。……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1〕。站在这样的视野上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一带一路”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古文化之间的关系了。宿白在系统梳理了中国考古发现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遗存之后写道:“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是吸收了邻近国家和民族,甚至较远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借鉴的。……任何民族和国家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都是因为其具有优秀、进步的东西。因此,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借鉴都是相互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只有中华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不够的,和中华民族以外各民族,特别和西方几个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和国家直接、间接的长期往还,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相互促进,影响面之广泛,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2〕近年来,类似这样的考古遗存不断出土,其中既有来自西方或受其影响的文物,也有通过丝绸之路向海外扩散的陶瓷器、漆器、铜镜、丝绸等各类文物〔3〕,这些重要发现开拓了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进入新时代,世界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于同步,其中一些涉及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领域,既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中外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更加紧密。如同严文明所言:“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考古学遗存那么丰富,遗址的类型又是那么复杂,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4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1、2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3〕 齐东方:《交流的价值——外来器物与中国文化》,葛巍、齐东方主编《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说是不计其数。……应该说这里是发展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可以产生考古学大师的地方。不过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不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那么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历史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受到世界历史的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就很难说得清楚。”〔1〕如今我们已经站在时代的前沿，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未曾做过的事业，应当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新一代考古人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总体上加强考古学理论建设与考古能力培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实现百年“中国梦”。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第一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设定了目标，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明确提出的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其中，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考古学、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的发展，兴起了各种新的理论和思潮，当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新考古学派〔2〕。这个学派认为传统考古学研究层次较低，主要使用归纳法，而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研究，应主要使用演绎法，即先根据某种假定的模式预设问题，再根据考古材料进行抽样验证、推演求证。在新考古学之后，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如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民族考古学派等至少八个所谓范式〔3〕。这些林林总总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思潮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此褒贬不一，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甚众。

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些所谓的新理论和范式，应当承认当中有其合理因素。这些新派理论对传统考古学长期以来缺乏理论构建、尤其是缺少从物到人、再到认识社会普遍和一般规律（法则）的“中层理论”（或称“中间理论”）的现象提出强烈的批评和反思，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4〕。但是，我们也应当深入思考这些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其所针对的研究对象是否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新考古学派和其他范式的理论价值和运作空间或许适合完全没有文字记载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某些史前文化，却未必适用于全球范围。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价值，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所积累的资料加以观察和验证。

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史学传统，而在其后几代中国考古学者不断进行田野调查发掘，积累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基础之上，对于诸如中华文明起源、演进发展模式、中国文明的特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层理论。前文所举苏

〔1〕 严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13、14 页，三秦出版社，1997 年。

〔2〕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140—1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3〕 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来自哪里？》，《南方文物》2013 年第 2 期。

〔4〕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16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秉琦以区系类型学说为基础,进而发展起来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演进三部曲、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等等,就是积极的高层次理论探索。

史前考古研究如此,对于具有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体系和浩若烟海的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考古,还是秦汉统一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考古,也就更不可能重走西方考古学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套用西方新考古学派的理论或各种所谓范式来解决中国问题、讲中国故事。我们应当以它山之石,攻中国之玉,将世界考古学的一般法则与中国考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模式出发〔1〕,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便提出了建设“中国学派”的问题〔2〕。后来张忠培进一步归纳了“中国学派”的特点: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观察分析考古现象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发展阶段;第二,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学类型学方法”,来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其谱系,进而研究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促进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他还总结说:“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量考古实践,正是生长出‘中国学派’的土壤;从实际出发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则是‘中国学派’出现的催化剂。”而“中国学派”的特色,就在于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位一体都是新中国所特有的、有着完整发展系列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3〕。今天,当我们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一新时代崇高目标奋勇攀登的时候,前人所积淀下来的这些丰富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附记:本文为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级研究基地学术成果之一。

〔1〕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216、217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2〕 1981年6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报告会上,苏秉琦先生在《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考古学研究中“中国学派”已经出现这一看法:“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42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3〕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42、43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MISS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by*

Huo Wei

By reviewing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ts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are distinctive. At that time, China was facing strong pressure from abroad social environment meanwhile, Chinese people need to change the mentality of cultural vulnerability of the nation, and re-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discipline of archaeology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o China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early Chines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with a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which had far-reaching effect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rcha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1949, under the guida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ory and regional systems and cultural types theory, Chinese archaeology has mad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taking up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in inheriting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exploring major issues includ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should focus on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well,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urther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Chinese archaeology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major landmark achievements, and the way of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fter its formation, especially to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of how the “5000-year continuous unity” was formed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rom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with “One Belt, One Road” as the main threa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dvocate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tell the “Chinese story” well, and contribute Chinese historical wisdom and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责任编辑:黄益飞